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

論中共現階段之土地改革運動

論中共現階段之「土地改革」運動

徐佛觀

一 中共的「土地法大綱」只是江西路線的還原

民國三十六年雙十節，中共公佈了他的「中國土地法大綱」。更於十月十六日廣播了一個「告農民書」，以作為這個大綱的實施辦法。此為抗戰以來中共策略上的一個巨大而顯明的轉變，關係於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前途者甚大。茲先述其要點，以供國人客觀研究之用。

大家都知道「放棄土地革命」為中共實行統一陣線，參加對日戰爭的重大條件之一。也可以說，是對中國客觀社會的一個重大讓步。抗戰發生後，他對土地所提出的口號是「減租減息」、「保租保息」的改良政策的口號。「鬥地」和「分地」，是在抗戰勝利以後才開始。但在鬥和分的過程中，也是逐步向前，而且不斷的加以「糾正」，以防

止「過火」，這不能完全說他是出於虛僞，因此他從江西逃到陝北一息僅存的當中，事實要求他對「江西路線」須作重大的反省。反省的結果，認為那是一個「可怕的失敗路線」，所以在抗戰過程中，他一直警戒着「走回江西的老路」。

但在抗戰勝利後，他又一步一步的走回老路去了，而以現在「土地法大綱」的頒佈，為一個最明顯的標誌。

江西路線的基石，是他所說的「土地革命」，他們所使用的主要手段，是鄉蘇維埃的暴民專政，這一切都在其「土地法大綱」中加強的復活了。

他對土地及其他民間財物處理的基本方針，是徹底沒收。大綱第一條說：「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」，第二條說：「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」，第三條說：「廢除一切祠堂，廟宇，寺院，學校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」，第四條說：「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」，第六條說：「鄉村中一切土地及公地，由鄉

村農會接收……，第八條說：「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，農具，房屋、糧食及其他財產……」，這都是江西時代的老辦法。不過應該特別注意的，他這裏所說的地主，實不同於我們一般意想中靠收租過生活的地主，而為「有土地者」之總稱。所以這裏的「地主」，是「有牲畜農具」，自己要種田的。而在告農民書的「第一」之（一）說：「不論大小地主，男女地主，本村外村地主，以及隱藏之財產裝窮的地主，化裝成商人，化裝成農民的地主，大家都可以清算，混進共產黨內的地主，混進新政權內的地主，混進八路軍的地主，以及混進工作團、學校、工廠、公家商店的地主，混進農會民兵的地主，不論他是什麼人，大家要拿去鬥，就可以拿去鬥，大家要怎樣懲辦，就可以怎樣懲辦。」由此可見，其所謂地主，是無所不包，並且絕不因為他們為中共努力而有所饒恕。所以第六條是說：「鄉村一切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」，而不是說鄉村地主的一切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，這恐怕比江西時代還要徹底。

其次，共匪這些沒收工作，並非由他的各級政權執行，而係由鄉村農會。原大綱第五條說：「鄉村農民大會及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貧農團大會，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構。」執行的方法，並不需要什麼法律程序規定，而僅係由農會「要怎樣懲辦，就怎樣懲辦。」這樣的話，在「告農民書」中凡說了十一次之多。可見這是他實行「土革」的唯一法典。至於農會的組織成份，則在「告農民書」第三之四說：「……為使農會純潔和有力量，貧僱農是農會當中的骨幹。自己組織僱農小組（按大約即係第五條所稱之貧農團），以發揮貧僱農在澈底平分土地當中的核心作用：……。」但這裏所說的貧僱農，又是些什麼人呢？「告農民書」第一之（五）說：「……這些人（即貧僱農），雖然有些小毛病，不能給他們戴上二流子和瓜懶漢的帽子。」歸根到底，作分地骨幹的，便是少數的流氓地痞，以流氓地痞來頂上農會的頭銜，又以農會來負起鄉蘇維埃的任務，而貫徹以「要怎樣懲辦便怎樣懲辦」的血腥手段。

土地沒收以後的處理方法，據大綱第六條「……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…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，並歸各人所有。第十一條說：「分配于人民的土地，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，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的權利。」在「告農民書」開首一段說：「現在共產黨又發出號召，實行徹底平分土地政策。」所謂「平分」，在「告農民書」第二之九說：「必須反對按勞動力分。」這是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」的真正共產主義的分法，已超過了蘇聯現時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」的階段甚遠。分以後，「歸各人所有」，這又是保持小農私有制，則不特和蘇聯的集體農場相去甚遠，即較之我國隋唐的「世業口分制」也落後得多。此一矛盾的解釋是：分了地的人，都去當炮灰了，沒有勞動力保留下來，所以不能按勞動力分，而貧僱農依然不是無產階級，無論如何不願共產，所以只好暫時在私有上讓步。至于平分的程度，則按大綱第十條（甲）「只有一口或二口人的貧苦農民，得由鄉村農民大會，酌量分給等于二口或三口

人的土地。又在「告農民書」第二之一說：「無地缺地的僱農貧農，應當先將一份好的分配他。」僱農貧農是鬥爭的骨幹，是鄉蘇維埃的主體，所以在「平分」之中，依然要保持着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「不、平、分」，並且這些人鬥了以後，便要去當砲灰，剩下的老小，要有一個新的奴隸來爲他耕種，所以其勢也不能不多分一點。

土地被沒收了以後的所謂地主怎樣辦呢？據大綱第十條（丁）說：「地主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」，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安頓，但在「告農民書」第二之（八）說：「地主在經過鬥爭之後，經大家討論同意，也可分給他一份。」可見這一份並不是有合法的保障，而是要經大家討論同意的。大家如何會同意？大家不同意便又如何？則只有天知道。除此以外，在「告農民書」第一之（八）說：「徹底打垮地主階級之後，各地農民應當繼續監視地主和其他壞份子的活動，農民退伍軍人、公家人不要和地主女人結婚，已經受了地主利用和地主女人結了婚的大家應當督促他宣佈離婚，如果他不聽，由

羣衆處罰。地主的女兒不准嫁人，他的兒子當然也不准娶人，而在「告農民書」提議」之二中說：「……今後不准地主階級富農當八路軍，也不准他們參加民兵……」所以他們連當砲灰的資格，都被取消了。像這樣的一羣，在現在匪區中，正走着三條路：（一）餓死，（二）逃出常難民，（三）新的奴隸，代「參軍」的英雄作牛馬。然則分得了土地的人，是否就解決了問題呢？據「告農民書」最後的「提議」之（一）說：「大家對共產黨要負責任，大家認爲鬥地主堅決，辦事大公無私，勤苦勞動，並且願意跟着毛主席走到底的，可以加入共產黨……」之（二）說：大家今後對八路軍要負責任，今後咱們農民都應當踴躍參戰參軍，澈底清查和整理民兵。原來分了土地後，並不是自種自享，而結果還是要爲共匪當牛馬和砲灰。

此外，不僅分土地工作完全交給農會，和農會所組成的人民法庭（見大綱十二條），並且根據大綱第十五條農會「有全權自由批評及彈劾各方各級的一切幹部」，而在「

告農民書」第三更明白的說：「農會有權審查一切組織和幹部，……大家要去怎樣鬥爭，就可以怎樣鬥爭，要怎樣懲辦，就可以怎樣懲辦……。」農會對幹部也可以直接行動，這豈不是太和自己過不去嗎？原因是人總是人，人總有一點人性，人人只可瘋狂于一時，不能沒有片刻的沉思和反省。在沉思和反省的一剎那，人性便要發生作用，便不能忍受共匪這種野獸的幹法。而共匪的劫持，便即立呈動搖。尤以認識字的人爲尤甚。所以共匪的政策，是以剛瘋狂的人，去殺瘋狂過後而快要清醒的人。等到現在殺人者快要清醒時，又由剛瘋狂者起而殺之。山東山西匪化已久的地方，自抗戰以來，他的地方幹部大體上已有三次大變動，開始是以中學生和小學教員爲基幹，以後便被流氓地痞所肅清所代替了。而現時則十八歲以下的孩子，又肅清代替了年紀較長的流氓地痞，等這批孩子長得大一點時，又有一批孩子起來肅清他。至於農會與幹部的關係，則是以農會份子去肅清幹部，因肅清幹部得力，而自己成爲幹部，因自己成爲幹部，而又被新

農會份子肅清，這樣的循環下去，只要中國人不死完，中共總不愁沒有農會和幹部作運用。

我們看了上述共匪「土地法大綱」的要點，也可以簡單看出共匪簡單而真實的面貌，僅將這簡單而真實的面貌和他過去所提的「和平民主」等口號，作一對照，也夠使許多人回味了。

二 中共的特質及其土地革命的真實任務

我在上節中，客觀的介紹了中共現階段的「土革」運動，是江西路線的還原。本節則就他「土革」運動的演變中，分析他過去對江西路線的清算，和現在的還原，都有他不得已的客觀的必然性。

土地問題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。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，見仁見智，迄今尚無定

論。所以我們在研究中共土革運動的時候，不可因出自中共而抹煞此一問題的客觀要求。亦不可因出自中共而限制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上所應有的虛衷商討。但我們提出土地問題。是認此爲中國現階段革命所當達到的目的。中共提出此一問題，則係認此爲中國現階段革命所當採取的手段。這是一個重大的分際。正因爲有這個分際，於是土地問題，在中共手裏，起了本質的變化。

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，（產業工人）是不可分離的。馬克思認爲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中，不僅因勞資階級意識的明顯，及生產迅速的集中，產業預備軍的不斷擴大，使共產主義有實現的可能。更主要的，是在大規模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之中，任何工人，不能單獨使用一整套機器和一整個工廠。因爲生產工具的共同性及生產組織的共同性，是可以使現代產業工人，克服數千年私有的傳統觀念，而浮起共產的意識，最低限度，可以接受共產的說教。這才是自誇爲「科學的社會主義」者所把握的最根本的科學根

據。一個人能單獨使用工具以解決自己生產的過程，他便壓根兒接受不了共產的浮像。共產主義對於這些人，便是共產主義者所鄙笑的「空想的社會主義」只算是空中樓閣。所以有了無產階級，才能有共產主義，這是共產主義者的經典。

正因為這樣，所以馬克思從來不把共產革命寄託在農民的身上。甚至於很少談到農民問題。一八六四年起，國際社會主義者中的馬克思主義者，爲了爭取選舉，開始積極向農民活動。一八六八年和六九年，在布魯塞爾和巴塞爾開的兩次會，大體上決定了農民社會主義化的原則，並發表了宣言，提出了實行的七項計劃。但農民層對於這些過度熱心的人們，却報以極冷淡的面孔，使他們即使在宣傳上也完全失敗。

列甯在產業落後的帝俄進行共產革命，爲克服這一不自然的狀態，大胆提出了農民問題。但這是一而因爲帝俄有大量的農奴作他的基礎；而一面在列甯天才領導之下，把農民當作工人的朋友，很巧妙的提出「聯盟」的口號，來解決此一矛盾。我們於此應當

注意的，列甯所堅持的是無產階級專政，所以對農民只說他是「朋友」，並不是自家人。是「聯盟」，並不是一體。當然，列甯爲要使朋友變爲自家人，而曾作過大的努力，這就是戰時共產主義對農民的種種。但農民的答覆，是給與蘇聯以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飢餓，使列甯不能不作策略上的重大讓步，而退回到新經濟政策。

中國共產黨，和世界任何國家的共產黨，有一個最大的根本不同之點：即是世界任何國家的共產黨，他總是在都市裏生根，在都市裏發榮滋長；而中國的共產黨，除了在共產主義小組時代，由幾個智識份子在上海盤桓一個短時間以後，他的組織，主要是設法在農村裏生根，尤其是在落後地區的農村裏，尋取他的生存條件。此即毛澤東所說的「在資本主義各國，是首先佔領城市，然後進攻鄉村」而在中國則「是走相反的道路」這一客觀的形勢，不是說共產黨本身有什麼差別，而是說共產黨生存的空間，有鉅大的差別。因爲中共在中國的都市，找不出他的生存根據。但即使是中共在實行統一戰線

的抗戰時期，毛澤東在中共成立二十週年紀念週上，開首便說「中國共產黨，是中國工人階級自己創造的黨，是代表工人階級的黨」。這一個漫天的大謊，自國際傳到中國；自中共創始以來，一直傳到毛澤東，中共黨人自己，又何嘗不知道。但如前所述的馬列對共產主義所需要的社會基礎的規定，逼着中國共產黨人，非如此撒謊不可。不如此撒謊，中國共產黨人，便只有站在共產主義之前，自己否定自己。

不過撒謊畢竟是撒謊。中共所要求的，是一種現實的力量，以此力量來奪取政權。撒謊或可換取那間良心上的安慰，和麻醉的作用，可是不能造成現實的力量。所以中共必須在此一漫天大謊之下，有所作爲。即是說要造成一種力量，以達成奪取政權的目的。

共產黨的力量，應該由無產階級產生。因爲這是共產主義的根據。中國三百萬產業工人，分佈在沿海都市。不說拿全國的人口作比例，即是單拿都市的人口作比例，也無論如何，無法構成一個強大階級，更談不到能夠專政的程度。何況連這三百萬工人，也

都站在民族國家，和現實生活的立場，誰也不願作中共的犧牲品。所以中共求生的第一個任務，便是要發現無產階級的代替品。這樣，就不得不垂青到農民的身上，要把無產階級鬥爭的方法，應用到農民身上，硬使農民演着無產階級的角色。於是土地革命，便成爲此一導演的魔術道具。

但講唯物史觀的共產黨人，不論魔術如何高明，畢竟了解農民總是農民。在中共「黨的建設」一書中，也分明指出連貧農雇農，都含有小資產階級的意識。所以不論把農民如何泡製，縱使能泡製得和無產階級一模一樣，而這總是模擬的贗品，膺品不是力量。膺品更不能持久。於是中共求生的第二個策略，便是不使農民停止在偽裝的無產階級上，而要由偽裝的無產階級，轉入到軍事武裝。將農民泡製爲無產階級；固是虛偽的。但將農民轉入到軍事武裝則極其真實。偽裝的無產階級不是力量；但軍事武裝則是力量。而轉入的橋樑，依然靠着他的所謂「土地革命」。史達林對中國革命特性的指示，是

「武裝的人民，反對武裝的反革命。」而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的六中全會結論說「在中國，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；而主要的組織是軍隊。例如民衆組織等，都是爲着戰爭的，都是爲了準備戰爭的。」又說「延安的一切，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。槍桿子裏面出一切。」這是他的老實話。因爲既然從中國的社會基礎上找不出他的生存根據來，則他不專靠槍桿靠什麼呢？

所以對於中共的所謂土革運動，一定要從泡製農村無產階級，以轉入澈底的武裝暴動的基本策略之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了解。

二 江西路線的形成及其成功與失敗

中共土革運動的演變，大體上可分爲三個時期。卽江西時期，抗戰時期及勝利以後，到現在的時期。若更確切一點，卽勝利以後，又可分爲自勝利開始，到三十六年四、

五月止，爲一個時期。自四、五月起，到現在止，又爲一個時期。茲就他的基本策略上，說他何以如此演變。

當北伐時期，農民運動所提出的口號，主要是「打倒土豪劣紳」，「取消高利貸」、「改善佃租關係」等等。這一方面是受了國民黨土地政策的制約，一方面是中共也沒有想在現社會基礎之上能提出更高的口號。但隨南京國民政府之成立，接着武漢也發動清共，使一時如火如荼的中共活動，烟消雲散，沒有抓住任何他所期望的果實，這便使第三國際不能有所警惕，而決定了在中國應該通過土地革命，以泡製階級；以階級製造武裝的指示。所以中共以十六年八月開的「八七會議」開始提出了土地革命，武裝暴動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三個互相關聯的口號。不過這次對土地的沒收，尙有「五十畝以上」的限制。而認爲是右傾機會主義。於是把五十畝以上的限制取消，並提出「按勞分配」的標準。但不久又因爲要打擊李立三，而清算李立三路線在土地革命中的左傾機會

主義。認按勞分配是富農路線，而提出平均分配的口號。不過清來清去，只能算是手段和技術問題；根本原則却是一致。●即是把無產階級的鬥爭、沒收、和組織形式等，都搬演到農村。在農村成立蘇維埃。於是在江西各地落後的農村中，居然有資產階級爛熟後的無產階級政權出現。不過在國際陰謀技術指揮之下的中共，是很聰明伶俐的。他自己的所演的這一大套，只是一種眩惑，而並不是一種陶醉。他真正的目的，是把農民逼成「赤衛隊」。由赤衛隊而「紅軍」。虛偽的無產階級不可靠，由虛偽的無產階級所造出來的紅軍，却是活生生的力量。

中共在江西這一套，並不是沒有收到成功。一方面，以無限制的沒收清算，破壞了任何人可以獨立生存的資具；爲農民只留下當赤衛隊和紅軍的一條單鞭窄路。一方面，沒收是採取逼迫着農民無限制的互相仇恨鬥爭的方法，破壞了任何人可以合理生存的信心，農民最後在精神上，也認爲只有當赤衛隊，當紅軍，才能掩護自己的罪惡。更加以

凡是覺得潛伏有中立性的人，都當作敵人而不斷的殘酷清洗。這樣一來在中共割制地區內的男女老少，都組入到他的戰鬥序列中間。而且中共的基本原則，是把握住人類的弱點，使其向獸性發展。人性而變爲獸性，便更可以忍受瘋狂殘暴的戰爭。所以他能上彈丸之地，抵抗數年之久，其天機正在于此。

但他這一套所得到的失敗，却遠超過了成功的成份。第一、勞力是農村最基本的生產工具。中共認按勞分配是富農路線，他約本意，是要勞力走上戰爭，而不讓勞力走到生產。這就否定了勞力在生產中的推動作用。結果生產一定荒廢停頓。於是中共只能靠發掘社會原來儲積的財富，以支持其戰爭。絕對不能培養出新的經濟力量來支持他的戰爭。社會原來儲積的力量完了，他的戰爭基礎也同時完了。過去江西紅區內是如此，現在山西河北山東等「老解放區」內也是如此。此一經濟的鐵則，不是中共主觀願望，所能改變的。第二、人類生存的慾望，總是希望向上，希望擴展。中共在江西依然承認土

地私有制。農民得到土地以後，便認爲土地是自己的，總希望用自己的勞力，在土地上多得點收穫，以改善他物質的生活。這幾乎可以說是人類的本能，人類的天性。但農民這種傾向，也同時引起對個人生命的珍惜，及對安定和平的願望。這與中共預定的目標，是完全相反。所以中共便在「富農思想」「富農路線」的階級罪名之下，加以殘酷的清洗，以克服農民這種本能的發展。可是本能是無法阻遏住的，正似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的野草。中共便不得不鎮壓，再鎮壓；清洗，再清洗。於是共區人口，既竭澤於砲灰，復揚梳於清洗鎮壓，漸漸同物質一樣的造成真空地帶。第三、中共這一套，連中國受壓迫的人民，在生活方式，生活意識，生活願望上，都不能接受。所以風聲所播，整個社會，都向他築起了銅牆鐵壁，封閉了中共一切開闢發展滲透之路。徐向前抱着石達開的雄心入川，那時四川內部四分五裂，社會情形混亂，中共認爲這是矛盾之大本營，發展的理想園地。但結果，却與中共的願望相反，演了和石達開一樣的悲劇。毛

澤東們逃出江西的萬里途中，凡有人烟之處，即非中共可以喘息之處，只好走蠻荒草地，才得一線的苟延。這種情形，一直繼續到抗戰發生以後。抗戰發生，中共取得了活動的自由。他第一個發展的願望，是寄託在他過去曾經做過巢穴的地點。可是出人意外的，凡是從前中共照顧過的地點，便是中共工作最碰壁的地區。這一鐵的事實，中共無論如何，不能不加以承認。第四、更其嚴重的，中共自組黨以來，一直都是若干智識份子的政治願望和政治野心所玩弄出來的。只要是智識份子，他儘可以在文化中有選擇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能完全跳出文化圈以外，去安頓他的生命。中共這一套澈底反文化的作法，不論運用如何好聽的名詞，但事實總是事實；每一智識份子，站在那種黑暗、橫暴、詐騙的事實之前，總要引起內心的反省，文化的反省。加以洵製農民為無產階級的办法，完全是魔術師所玩的把戲，沒有客觀的真實性，便沒有客觀上的衡量標準和安定作用。所以中共幹部的內心和外境，沒有方法不使之不動搖分裂，於是中共內部，也

不、得、不、分、裂、，再、分、裂、；肅、清、，再、肅、清、。江、西、時、代、，中、共、自、己、互、相、殘、殺、之、慘、，正、不、亞、於、他、們、對、人、民、的、殘、殺、。

四 由江西路線的清算到民族民主陣線的偽裝

中共在江西土地革命的總答覆，便是由草地逃亡流落在陝北的一萬幾千殘兵敗將。中共要想繼續生存，便不能不面對這一鐵的事實，重新有所決定。恰好在希特勒登台以後的第三國際，也逼着作重大策略的轉變，于是在歐洲，有人民陣線。在中國，則是民族陣線。二者都是收拾起階級鬥爭的狐狸尾巴，而以階級聯合的姿態出現的。中共在此一策略之下，宣佈取消土地革命，取消蘇維埃，回復到民國十三年國民黨「減租減息」的口號。並且很技巧的加上「保租保息」，和「三三制政權」的口號，以作各階級聯合起來的證明。這樣一來，中共本身，好像已經忘記了江西的那一套；更希望社會，希

望農民，也忘記他在江西的那一套。中共的工作技術，的確是前進了一大步。他說得這樣的真，做得這樣的像，扣得這樣的緊。居然在抗戰初期，對他已經完全關了門的社會，重新被他叩開。而國際獵奇的記者們，便紛紛的說中國共產黨，只是土地改良主義者，並不是真正共產黨。於是毛澤東更爲得意，天花亂墜的說：「中國不適宜于共產主義。中國共產黨只得對於將來的信仰上，保持共產主義。但現階段，決不實行共產主義。共產黨所做的，只是三民主義，只是農民改良主義者。」這更使一般國際人士，尤其是天真爛漫的美國人士，奔走相告的說：「中國共產黨已經變質了。」主要的理由，便是在土地問題上取消了階級鬥爭的觀點和方法。但是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特性的指示，並不是以農民階級來代替工人階級，而是以「武裝」力量來代替階級的力量。這就是毛澤東一再所說的「沒有武裝，便沒有中國共產黨，便沒有中國的革命。」所以中共可以放棄虛偽的農村無產階級，但決不能放棄武裝。中共不僅是因爲民族的口號，比階級的口

號更爲動人，而放棄階級的口號。更重要的，是他發現在民族的口號之下，一樣的可以收擴大武裝的實效。民族口號，有階級口號之利，而無階級口號之害。這便決定了中共聰明的選擇。

中共以民族口號來擴充武裝的方法，是「一切爲了抗戰」，在抗戰的名義之下，來要求人民的一切。並且抗戰是「各階層聯合起來」的共同任務，所以各階層都應該參加到他的武裝裏面來。中共擴充武裝的慾望沒有底止，他的動員也沒有限度。結果動員變成了江西時期變相的沒收。只不過把沒收的程序，很技巧的拉長。像原來準備一刀砍死的人，改而吸血吸精，使其萎頓枯槁以死，而反可不居殺人之名。但民衆不論如何儼然，對於自己的生死和中共「游無敵之地，擊無辜之民」的這一套作法，誰還看不清楚，誰還不想掙扎。於是抗戰中前一時期的「打漢奸」後一時期的「打國特」，便代替了江西時期的「肅清階級敵人，肅清富農路線」的口號，而爲他盡鎮壓人民，摧毀社會之責。

至於「人人盤查，處處放哨」，「人人監視，刻刻檢舉」的這一套把社會澈底特務化的方法，尤其與江西時期毫無二致。中共組織的真義，是把每一個人都隔離起來，以防止人與人之間，由平面的自由聯合而發生反抗的力量。把每個地區都封鎖起來，以防止由真實消息的透露，而使旁的地區發生反感，且妨礙了自己的政治宣傳。中共在抗戰中的真實情形，反成了國內國際的一大爭點，其根源即在於此。但中共儘管以「動員」來代替「沒收」，他決不公開提出「沒收」。以「打漢奸」「打國特」來代替「階級鬥爭」，但他決不公開提出「階級鬥爭」。由此可見他對於江西路線警惕之深。更由此而可瞭解什麼是毛澤東所說的「馬列主義中國化」。

不管人民的生死如何，中共這一政策是相當的成功了。他由抗戰初時的一萬幾千殘兵敗將，發展到幾十萬。毛澤東抗戰的基本政略是「抗戰一定是需要的，但不需要它迅速的勝利。」他預計日本人可以消耗完政府的力量，同時便可以培養成他自己的力量。

這、是、奪、取、政、權、最、巧、妙、的、方、法。但出乎意料以外的，日本突然投降了。這不僅說明了國民政府的勝利，而且也毀滅了中共拿抗戰來作爲榨壓人民，擴張武力的工具。中共過去對含着眼淚的人民說：「我所以要你們的一切，都是爲了抗戰。」現在抗戰勝利了，總應該讓人民鬆口氣。中共的答覆，却是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擴軍運動，並接連着三次總動員。中共說：「抗戰雖然結束，但我現在要保衛民主。爲了保衛民主，不能不比抗戰更加倍擴軍。」這就是說，中共當民族的口號失掉作用以後，依然不敢拿出階級的口號，而以「保衛民主」的口號來負擴軍之責。可是在中共統治之下，什麼是民主呢？人民根本就有點模糊。而且「保衛民主」的反面，是反抗中央。不論中共對中央作如何的咀咒，可是人民並不是不會在中央的治權底下過過生活。中央縱然萬分不民主，但村與村之間，總可以自由來往。人與人之間，總可以自由講話。徵兵徵糧雖辦得不好，但總有一個限度。生活雖未能提高，但總有個保障。人民把中央的過去，和現在的中共，稍作比較，一切都

是太明顯了，這是任何巧妙的宣傳所不能欺瞞的。要人民再拿剩下的極其可憐的血，去保衛中共所賜與的這種民主，人民縱如何忠厚可欺，也未免太滑稽了。中共心內又何嘗自己不明白？武裝不能不擴充，但抗戰的工具已經消滅，階級鬥爭的工具又不敢拿出來，而保衛民主的這一工具，也實在太空虛脆弱，在人民前無法自圓其說。中共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於是對土地問題，不能再變變手法。所以自抗戰勝利之日起，到卅六年春季底止，中共一面還喊着減租，減息，一面却又發動土地鬥爭。鬥爭的方式，和江西時代相同。但發動的步驟，却扣得很緊。每一個地區內，選擇着典型去鬥。而且鬥的程度，也不斷的「糾正」，防其「過火」。中共的意思，是覺得不鬥便不能逼着人民走進軍隊。太鬥狠了，又怕重蹈江西時期的覆轍。所以採擇了「半江西時期的路線」。果然此一策略，收到了成功。鬥過地的人，中共告訴他：「你只有參軍，才可以保護你鬥爭的果實。」被鬥過地的人，中共告訴他：「你只有參軍，方可以表白心跡，免得再被鬥。」

於是鬥的，被鬥的，都走進了中共的軍隊。而中共所豢養的一班哈巴狗，却從旁喝彩的說：「中共並不是馬列主義，因為他並沒有實行階級鬥爭，所以中共是民主主義。」中共真是名利雙收，無往不利！

五 江西路綫的還原並不是中共主觀的願望

但在三十五年七月開始的蘇北戰役中，又粉碎了中共的好夢。蘇北之役，中共最大的失敗，並不是在軍事，而是在社會。國軍未到以前，中共以為他所控制的社會，十分鞏固。及國軍所到，整個的社會，却完全翻轉來了。不止是被鬥爭者如此，未被鬥爭者，乃至鬥爭者，全是如此。淮陰之役，國軍一面進軍，一面修路，每一段路，都是五萬十萬的民衆，很熱烈的在短期內完成。這和江西時期，國軍一入匪區，只得到少數老嫗兒童的情形，完全是兩樣。中共所恃的並不是他的兵力，而恃的是他能控制社會，在控制

的社會內，可以掩護和培養壯大的兵力。現在他明瞭他所控制的社會，完全是假的。中共以一套魔術來圈住人民，而人民一遇着機會，却依然會拿出自己本來的面目和志願來對待中共，這對中共當然是一個致命的打擊。於是中共不能不重新開始一個大檢討。檢討的結果，固然知道根本原因，是因爲人民不能接受鬥爭，不能接受參軍和叛亂。但若中共果真接受人民此種要求，則惟有退居於和平合法的政黨地位。這是和第三國際所指示的中國革命的特性，無法相容的。可以擺這一套來騙外國人，但中共決不能真的如此做。中共所能做的，只有暫時忘記江西時期的教訓，而回復到江西的路線上去。他認爲社會的所以能翻面，第一是在半江西路線的作法之下，原來的社會組織與意識，還留着有根；且還隱蔽着有暫時屈伏的社會敵意。假定在社會的組織方面，意識方面，和人的因素方面，把他弄得一點根也沒有了，則對社會的控制，一定可以靠得住。這除了江西路線以外，還有什麼路可走？

三十六年中共的「五四指示」，這是中共回復江西路線的祕密試驗。三十六年雙十節，中共「土地法大綱」的公佈，這是中共回復江西路線的正式開張。大綱的要點，是爲土地法，但不是用法來解決土地，而是用「澈底的鬥爭」。中共有自己所建立的政權，但不是以政權來執行解決土地的任務，而是以「雇貧農小組」。凡是與文化、宗教有關的，更摧毀得利害。凡是認識字的人，更殘殺得利害。中共認爲只有這樣，才可以造成社會不能恢復的仇恨與毀滅。只有這樣，才可以造成不受絲毫文化影響的暴力狂潮。在這種仇恨，毀滅，和暴力狂潮之下，人民殺的殺了，逃的逃了，剩下來的不跟中共當砲灰，更有什麼旁的方法可想？

由此，可見中共回復到江西路線，並不是出於他主觀的願望，而是一步一步的，由客觀的事實，逼着他不能不如此的。這是因爲他無法忘記這條路線所給與他的教訓。所以這次一面提出「土地法大綱」，一面便提出「整編黨的队伍」的口號。而三個月來，

中共區裏，黨內黨外，所展開的瘋狂殘殺清洗，正說明江西時期的四大教訓，隨江西路線以俱來。這就是共產主義者所誇張的「社會演進的鐵則」，也是中共自己爲自己所安排的命運。

